

★ 陈云研究丛书 ★
陈云纪念馆 编

陳雲

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高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陳雲

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高强◎著

责任编辑：刘伟

封面设计：汪莹

版式设计：安宏川

责任校对：周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云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 陈云纪念馆 编；高强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陈云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14927-1

I. ①陈… II. ①陈… ②高… III. ①陈云（1905~1995）－反通胀－
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077 号

陈云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CHENYUN FAN TONGZHANG SHIJIAN YU SIXIANG YANJIU

陈云纪念馆 编 高 强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54 千字

ISBN 978-7-01-014927-1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陈云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任 潘 敏

副主任 徐建刚 徐建平

主编 徐建平

副主编 马继奋

编委 徐建平 马继奋 方 芳 严 玮

周伟锋 陈 渊 房 中

美术编辑 李 迪 陈佳堃

前　　言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他曾先后多次主持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其间，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经济体制也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市场经济、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四个大的阶段。像陈云这样经历过多种经济体制背景的大国经济领导人，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

陈云在主持新中国财经工作期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对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陈云近半个世纪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不难发现，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背景下，陈云都非常重视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反对通货膨胀是他一直坚持的重要原则，维持物价稳定始终是他追求的主要经济目标和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一五”期间的统购统销、综合平衡，“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对物价“闯关”等等，都是陈云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经典事例。陈云的反通胀实践和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共和国经济史中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陈云反通货膨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归纳其基本理论内涵，评价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阐述其意义和影响，不仅是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陈云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归纳陈云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反通胀操作的特点，梳理陈云反通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对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如影随形，妨碍着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全面回顾陈云的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深入研究陈云的反通胀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影响，特别是他从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和经济稳定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综合平衡、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观点，坚持中央政府要掌握宏观调控资源的观点，坚持合理引导、调节、管理和控制社会需求的观点，以及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政治和行政手段的方法，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特别是如何保持人民币币值和物价稳定，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陈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反通胀 实践及思想特征	1
第一节 1937—1949 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2	
第二节 陕甘宁时期的反通胀实践及思想特征 /12	
第三节 东北时期的反通胀实践和思想特征 /33	
第二章 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治理和 防范通货膨胀的实践及思想特征	44
第一节 打击投机势力，稳定市场物价 /45	
第二节 统一财经，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64	
第三节 调整工商业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通胀实践 /72	
第四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反通胀思想特征 /87	
第三章 陈云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62）防范和 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及思想特征	103
第一节 “一五”时期防范通货膨胀的实践 /104	



陳雲

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第二节 提出、实施、坚持和完善“统购统销”政策	/114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治理通货膨胀的实践	/134
第四节 计划经济时期反通胀思想的主要特征	/150
第四章 陈云在转轨时期（1979—1992）防范和治理 通货膨胀的实践及思想特征	165
第一节 1979—1981年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反通胀实践	/165
第二节 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反通胀实践	/184
第三节 转轨时期反通胀思想的主要特征	/214
第五章 陈云反通胀思想的基本内涵及评价	225
第一节 反通胀的原因和目的	/226
第二节 反通胀的方法和手段	/234
第三节 陈云反通胀思想的历史作用	/244
第四节 陈云反通胀思想的意义和影响	/265
参考文献	286
主题索引	289
后记	290

第一章

陈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 反通胀实践及思想特征

在论述陈云的反通胀实践和思想之前，首先要追述 1937—1949 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目的是为研究提供宏观的历史背景，并力图将研究对象置于相对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下，从中国 20 世纪货币史和通货膨胀史的视角来考察陈云的反通胀实践和思想。众所周知，1937—1949 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中国 20 世纪最著名也是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剧烈程度和持续时间甚至在世界货币史和通货膨胀史中也十分罕见。这次通货膨胀几乎摧毁了中国人民对国家强制发行的纸质货币的全部信任，对当时及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国经济、政治乃至人民心理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陈云亲身经历了这次长达 12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痛苦而深刻的体验使他对通货膨胀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治理和防范通货膨胀的实践中，陈云和他的同事们常以这次通货膨胀为参照，认真总结并记取国民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国民政府从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到 1948 年 8 月发行金圆券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为陈云在 1949—1952 年终结恶性通货膨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追述 1937—1949 年旧中国通货膨胀，不仅为考察陈云反通胀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象，可以相对客观公允地比较和评价陈云治理



通货膨胀的效果，也使研究陈云反通胀思想的过程更具历史感。

第一节 1937—1949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货币稳定、紧缩和膨胀曾交替出现。中国由于长期的财政通货膨胀化趋势，无限制地创造和发行新的支付手段使货币体系被完全破坏，导致了历史上多个王朝的覆灭。自从十一世纪纸币出现以来，政府当局得以相对轻松地扩张货币供给。无论纸币作为金、银或铜币的补充，当它成为统治集团提高支出水平的手段时，通货膨胀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①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发生在1937—1949年的通货膨胀不仅重复了中国通货膨胀史中很多恶劣的先例，如财政通货膨胀化、无限制发行纸币等等，而且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地的崩溃。法币改革给通货膨胀提供了可能性，但长期战争是造成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1935年11月4日，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实施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1936年1月20日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定货币，禁止银币流通，实行白银国有。同时宣布通过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保持法币对外汇价的稳定。法币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这种贵金属的直接联系，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白银本位的历史，代之以与英镑和美元相联系的“汇兑本位”货币制度。中国自此开始全面实行以国家纸币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尽管法币改革是为了应对美国白银政策影响而被动进行的，但从

^① Kia-Ngau Chang,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New York: Th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8, p.3.

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次币制改革仍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缓和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和刺激生产贸易发展的作用。从法币开始发行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发行准备充足，国家银行通过买卖外汇维持汇率，法币信誉很好，币值也比较稳定。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9月，法币对美元、英镑、日元的汇价波动很小，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对外汇价最平稳的国家之一。从法币改革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中国总物价水平也波动很小。1960年陈云曾指出：“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物价微涨，但币值基本上稳定，那时一元钱（法币）的购买力约等于人民币二元五角或三元。”^①

由于法币不再与贵金属相联系，也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强制流通且不可兑换的国家纸币。对政府和货币当局而言，法币发行没有不可逾越的数量障碍，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发行。这就为日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中国从实物本位过渡到纸币本位，这一所谓的改革使得通过通胀性的纸币发行来为后来的战争支出融资变得更加便捷，也更有吸引力。在战争给养及随后革命的压力之下，中国可能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采取纸币发行政策并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但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货币结构的影响无疑提高了上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加速了其进程。”^②

但是，法币改革仅为纸币通货膨胀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1936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52.98亿元，粮食产量为1.5亿吨，棉花产量为84.9万吨，均为历史最高水平；全年财政总收入达19.73亿元，不仅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在国民政府财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一九〇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②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巴曙松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史上是绝无仅有的。^①1936年法币币值比较稳定，物价水平波动很小，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没有随后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中国经济如果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物价水平和法币币值虽难免波动，但至少不会发生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1937—1945）

（一）抗战初期的通货膨胀（1937—1939）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不仅打断了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十年”，而且在中国触发了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富庶地区以及主要工商业中心和港口迅速陷落。到1938年年底，“日寇遂占有了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由于主要税源地区的丧失，到1939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比战前降低了63%。而为满足抗战需要，国民政府的各项支出大幅增加，1937—1939年期间，直接用于军队和重大战略建筑工程的开支，就占政府总支出的70%。“政府收支不敷之数则高达三分之一强。”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在1937年上半年尚有盈余，1939年年底支出法币27.9亿元，收入7.4亿元，赤字20.5亿元。^②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1937年到1938年上半年，政府靠出售外汇和发行公债弥补了40%，因此，货币增发尚属缓慢。1939年以后，由于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已消耗殆尽，公债发行微乎其微，1938年6月以后，政府只能靠发行货币来维持战争支出。1939年法币发行额为42.9亿元，是战前发行量的3倍。导致法币增发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为了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的需要，从1939年起对私营企业大量提供信贷，到1939年年底国家银行向私营公商业贷款

^① 朱英、石柏林：《中国近代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②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达14.7亿元。^①这项政策在战争初期确实起到了刺激工业生产的作用，但由于信贷的资金来源也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所以信贷扩张也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肇因之一。

从抗战开始到1939年年底，整个中国后方的物价平均水平提高了两倍，同期货币发行也增加了两倍，无论用何种标准衡量，都属于通货膨胀。日本侵略导致的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是造成通胀的主要原因，1939年财政赤字和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信贷的总额与法币发行额大致持平，说明货币发行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国家银行发放贷款。1937—1939年法币发行增加了两倍，与物价上涨速度基本一致，通货膨胀的程度还不是很剧烈，对国计民生的负面影响也尚未充分暴露。

（二）抗战中期的通货膨胀（1940—1941）

1940年是旧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这时起，物价上涨速度开始超过货币增发速度。1941年年底整个中国后方的物价指数较1939年年底上涨了5.9倍，货币发行额增加了2.5倍，物价涨幅超过货币发行增幅一倍多。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物价上涨已不仅源于货币增发，货币流通速度也在加快。原来作为储蓄的货币开始重新进入流通。它预示人民对法币的信心发生动摇，开始囤积物资。

造成这一时期通货膨胀加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军进一步破坏和封锁了中国的对外联系。随着滇越线被切断，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1941年大后方从外输入的物资仅及1939年1/3。二是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1941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法币86.9亿元，是1939年的4.23倍；收入占支出的比例从1939年的26%降至1941年13%。三是1940—1941年中国农业连续遭受严重的歉收。1940年农产品产量降低了10%，1941年继续下降，比战前平均降低9%—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页。



陳雲

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13%。^①

(三) 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1942—1945)

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1945年6月整个中国后方物价指数较1941年年底上涨了94.5倍，同期货币发行增加25倍，物价涨幅超过货币发行增幅将近3倍。这一时期政府财政收支因田赋征实、粮米征购等措施而有所改善。造成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法币普遍丧失信心，不愿也不敢存储货币，货币流通速度日益加快。囤积物资、进行投机成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日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政府也采取了限制银行贷款和控制物价等措施，但收效不大。^②

二、1945—1949年的通货膨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人民对未来抱有期许，人心思定。当时中国中央银行拥有8.7亿美元外汇，600多万两黄金，以及大量白银和银元，按当时的价格，共约合12多亿美元。中国国民政府还掌握了东北各省和台湾省的巨大财富，接收了大量以往敌战区的日伪产业和物资以及太平洋各岛美军的剩余物资。^③1945年8月到12月，全国物价也确实出现了短暂的下跌和稳定。如果这时当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平衡财政、抑制甚至消除八年抗日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坚持内战、拒绝和平。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不断增加，使人民因胜利而恢复的对货币的信心一扫而光，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6页。

②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8页。

③ 李立侠等：《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一) 法币的崩溃 (1945.8—1948.8)

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法币发行指数为 282 倍，物价指数为 2133 倍（按 1945 年 6 月数据计算），物价上涨速度是法币增发速度 7.56 倍；而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8 年 8 月三年的时间里，法币发行增加了 1190 倍，标志性的上海趸售物价指数则上涨了 14238 倍，物价上涨速度是法币增发速度的 12 倍，远较抗日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为甚。^①造成如此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仍是巨额的财政赤字。1946 年政府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了 2.2 倍，1947 年增加了 4.7 倍，1948 年上半年增加了 14 倍；1946 年财政赤字占支出的比例为 47%，1947 年为 67%，1948 年为 66%。^②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国民政府特别是作为货币当局的中央银行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先是企图用开放外汇市场和抛售黄金的办法稳定法币币值，仅在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抛售外汇 3.54 亿美元和黄金 350 余万两，几乎花掉储备的一半。^③同期法币增发了 2.7 倍，上海趸售物价指数上升了不到 2.9 倍，货币发行和物价上涨的幅度大致相符。应该说上述措施对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它大量消耗政府掌握的外汇和金银储备，无法继续维持。1947 年 2 月，国民政府又实行各种管制办法，冻结工资和物价，禁止私人买卖和拥有黄金和外汇。但执行不到一个月即告失效，4 月份开始美元和各种商品黑市相继出现。政府不得不在 4 月份提高限价，5 月份对工资解冻，上海批发物价月增长率从实施管制前的 19% 跳升到 5 月份的 54%，管制措施又告失败。此后，中央银行又采取过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如发行美元债券和国库券，放弃固定的官方汇率制、废止物价和工资

^① 参见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61—62 页。

^② 参见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51 页。

^③ 李立侠等：《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 页。



陳雲

反通胀实践与思想研究

的限额办法，对薪金和工资收入者实行低价配发生活必需品，以及恢复限制信贷和提高银行利息等。但对于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的法币快速增发，只能起到一点缓和的作用。1947年法币增发了10倍，而同年上海批发物价几乎上升了15倍。^①通货膨胀继续恶化。进入1948年，物价几乎每两个月翻一番，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却为此之半。蒋介石为之震动，竟亲自下令停止一切贷款，但财政赤字引起的法币泛滥使投机活动大行其道，信贷控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比年初增发了约19倍，上海趸售物价指数上涨了73倍。^②法币的印刷速度竟然赶不上发行速度，法币已经陷于崩溃。

（二）金圆券的覆灭（1948.8—1949.5）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紧急命令宣布实行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作为本位币，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兑换率为一金圆券等于300万法币；金圆券的发行准备40%为黄金、白银和外汇；金圆券的发行额以2亿元为限；所有商品的价格一律按8月19日的价格折合金圆券加以冻结，非经政府批准，不得擅自涨价；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或外汇，其已持有者，概须上缴，政府以金圆券作价收兑。此外，还规定了改进税制、统制信贷、降低利率、严禁囤积物资等办法。为了保证货币改革的进行，当局还专门派遣高级官员分驻上海、天津和广州亲自负责执行以上各项规定。^③蒋经国亲率秘密警察赴上海督导。

国民党当局企图用专政手段强力压制物价，以达到维持金融的目的，在金圆券发行之初在上海等地确实出现了短暂的物价稳定。然而由于军事开支巨大，财政赤字继续膨胀，到8月底金圆券就突破了2亿元的发行限额，到10月底，金圆券的流通额就达到18.5亿元，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② 参见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1—62页。

③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超过发行限额的 8 倍。10 月份开始，国民党当局被迫放弃物价管制，通货膨胀再度爆发，物价一周之内竟上涨了 11 倍。国民党当局 11 月份宣布金圆券贬值 80%（按黄金折算），并准许自由兑换黄金，但这时外汇金银储备已所剩无几，加之人民群众已成惊弓之鸟，蜂拥兑换，到 12 月份中央银行就停止实行上述办法，挽救金圆券信用的最后努力遂告失败。^①进入 1949 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制度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各地人民群众、工商企业甚至国民党军政单位纷纷拒用金圆券，而地方政府也都准备发行地方货币，金圆券作为货币的功能已消失殆尽，渐渐被逐出流通。

1948 年以前国民党当局还对治理通货膨胀采取了一些措施，1948 年后由于军事形势的逆转和美援的减少，他们已无力也无意抑制通货膨胀。发行金圆券本身是国民党当局在看到大势已去后的垂死挣扎，其根本目的是从人民群众和工商界手中最后再掠夺一次财富。他们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 1948 年 10 月向立法院的报告，国民党当局利用货币改革共搜刮金银、外汇共值 2 亿美元。^②

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5 月，金圆券发行增加了 65 万倍，而黄金市价上涨了 130 万倍，美钞市价上涨了 130 万倍，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 120 万倍。^③

三、1937—1949 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成因、特点及其治理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

1937—1949 年中国通货膨胀的总体背景是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战争是造成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和根本的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9 页。

^② 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90 页。

^③ 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86 页。